

日尔蒙斯基史诗学研究初探——以英雄史诗《阿勒帕米西》为中心

张京京

摘要：日尔蒙斯基（1891—1971）的研究涉及语言学、民俗学和诗学等诸多学科，他批判地继承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论，并在突厥语族民族史诗的研究中发展了历史类型学理论。英雄史诗《阿勒帕米西》是日尔蒙斯基史诗学研究最主要的课题之一，他以“阿勒帕米西”文本群为根基，将史诗的历史溯源与“神话”“故事”“史诗”三种体裁的流变关系研究相结合，打破了东西方史诗研究的壁垒，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理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尔蒙斯基的理论方法影响了包括梅列金斯基、涅克留多夫等人在内的一大批文艺学家。时至今日，对于民族史诗以及诗学理论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日尔蒙斯基对英雄史诗《阿勒帕米西》的研究为中心，探索其史诗学研究理论的构建与发展脉络，并从整体对其理论意义进行探讨。

关键词：日尔蒙斯基 英雄史诗 《阿勒帕米西》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5-0187(2023)04-0049-07

文艺学家日尔蒙斯基（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的学术生涯以日耳曼学为起点。20世纪10年代，他开始在圣彼得堡大学接受历史语言学训练，学习日耳曼语。当时，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布朗掌管着罗马—日耳曼学系，后者将研究聚焦于语言学和历史学。20世纪20至30年代间，日尔蒙斯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史、诗学、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上，继承并发展了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致力于诗歌的格律、语言和风格等诗学理论研究，当时东方文学还不是他的研究重心。后来，随着日尔蒙斯基将研究兴趣转向类型学的比较研究，东方文学，尤其是东方民间文学成为他研究工作的中心。他不再囿于西欧书面传统，将民族口头史诗资料纳入到历史诗学研究之中。1941年，受时局影响，日尔蒙斯基来到中亚，在此期间，他与扎里弗夫、科诺诺夫等学者相识，开始接触突厥语族民间文学传统，将相关材料应用到自己的语言学研究中，并将史学、诗学和修辞学纳入突厥

语族民族史诗发生学的分析之中。“二战”结束后，突厥语族民间文学成为日尔蒙斯基的学术研究重心。期间，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独著《阿勒帕米西传说与勇士故事》《人民英雄史诗》《〈玛纳斯〉研究导论》以及与扎里弗夫的合著《乌兹别克人民英雄史诗》等。

一、日尔蒙斯基的史诗学研究重心

从整体上看，日尔蒙斯基史诗学研究以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为重心，其中，“跨文化比较研究”可视为统领日尔蒙斯基理论构建的主要方向之一。在日尔蒙斯基看来，科学的口传史诗研究方法应当建立在对史诗文本的各种版本、传播和历史与现状、个别史诗艺人以及演说流派充分掌握的基础之上。此外，研究者还应从世界文学的宏观视角观照研究对象，将西欧、印度、伊朗等地的书面文学传统纳入史诗研究的参考坐标系当中。从一方面来看，日尔蒙

作者简介：张京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系2022级博士研究生。

斯基的这种“总体文学”的研究方法承自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研究传统，后者将研究对象置于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之中，以宏观视角进行规律的摸索和特性的总结。从另一方面来说，日尔蒙斯基整体比较的研究方法与苏联民间文学研究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日尔蒙斯基看来，“比较文学史的主要前提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2]。在这种研究理念的统领之下，日尔蒙斯基酝酿出将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阿勒帕米西》与荷马史诗《奥德赛》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全新的视角开辟了突厥语族民族史诗研究和东西方史诗比较研究的新路径。于是，在他的著作中，东西方史诗传统成了一条文化历史进程上的两个分支。^[3]

日尔蒙斯基史诗研究理论构建的第二条脉络为“历史类型学研究”。在研究突厥语族民族史诗的过程中，日尔蒙斯基将“地理—历史”与“母题—情节”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找到了民族英雄史诗的一般类型。在将突厥语族民族和西伯利亚的蒙古语族民族传唱的史诗和故事进行汇集、分类和比较后，日尔蒙斯基找到了史诗历史溯源工作的钥匙——“勇士故事”。以在中亚地区广为流传、为多民族所共享的英雄史诗《阿勒帕米西》^[4]为例，日尔蒙斯基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该史诗的源头极有可能要追溯到突厥汗国时期在阿尔泰山一带流传的勇士故事《阿勒普—玛纳什》，并对“神话”“故事”“史诗”共有情节母题的流传和变异进行了历史类型学的分析。

总体来说，日尔蒙斯基不仅在研究材料的选择上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边界，他的研究方法也体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日尔蒙斯基的史诗学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伴随着他对突厥史诗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趋成熟，他将“总体文学”“情节诗学”等继承自维谢洛夫斯基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与自己在语言学研究中积累的实证和类型学研究方法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理论充分融合，进而深入挖掘史诗的“历史性”与“人民性”，从而在世界史诗乃至世界文学的图景中描画出突厥语族民族史诗的生成和发展脉络。

二、日尔蒙斯基与《阿勒帕米西》

中亚民间文学的系统研究始于拉德洛夫，尔后，又涌现出巴托尔德、波塔宁、梅利奥兰斯基、万贝里、奥尔洛夫等学者，但真正触及乌兹别克史诗研究的学者是日尔蒙斯基。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他围绕《阿勒帕米西》展开的研究。

在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史诗艺人、不同流派的“阿勒帕米西型”故事进行对比分析的过程中，日尔蒙斯基发现了《阿勒帕米西》的生成脉络，提出该史诗的基础材料来源于阿尔泰的勇士故事《阿勒普—玛纳什》，后者于6—8世纪形成于阿尔泰山一带。随后，乌古斯人将该故事从阿尔泰山带到了锡尔达里河下游，于9—10世纪形成了乌古斯版的原型。在这里，该故事被融入关于萨洛尔—喀山的系列英雄赞歌之中，并获得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发展。在塞尔柱帝国时期（11世纪），它从锡尔达里河一带流传到外高加索及小亚细亚地区。后来，它随着克普恰克部落一路向西，传播到哈萨克斯坦、巴什基尔河、伏尔加河一带。再之后，它随着昔班尼汗的乌兹别克部落行进，被带到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也就是弘吉刺特版所说的拜孙地区。在这里，英雄史诗《阿勒帕米西》以古老的勇士赞歌或故事为基础形成，并开始在乌兹别克、卡拉卡尔帕克和哈萨克人中流传开来。进而，日尔蒙斯基将《阿勒帕米西》分成以下四大类。^[5]

①弘吉刺特版。以史诗《阿勒帕米西》的形式在乌兹别克、卡拉卡尔帕克、哈萨克和塔吉克地区流传。

②乌古斯版。15—16世纪，在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被记录为《关于卡姆—布勒之子——巴姆斯别—列克的传说》（出自《先祖阔尔库特之书》）。

③克普恰克版。在巴什基尔人和喀山的鞑靼人中，它在一定程度上经由现代化改造，以当代“传说”的形式流传（称为《阿勒帕米沙》或《阿勒帕姆沙》）。

④阿尔泰版。在山区的阿尔泰人之中以古老的英雄故事《阿勒普—玛纳什》闻名。

在进行史诗文本的比较研究时，日尔蒙斯基并不拘泥于“经典版”，他广泛地将不同艺人演唱的文本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体系，从而追觅“变”与“不变”

的客观规律。首先，在史诗的演唱风格上，不同地区的歌手在演唱方式上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例如，日尔蒙斯基在研究马哈迈德穆罗德和贝克穆罗德的塔吉克异文时发现，流传于塔吉克民间的《阿勒帕米沙》诗行结尾总会加上语气词“欸”^[6]。这是塔吉克民歌的特点。

此外，在同一地区的版本中，不同歌手的演唱也不全然相同。在对弘吉刺特版的《阿勒帕米西》进行情节母题的分析时，除了经典的法济尔版外，日尔蒙斯基还对包括埃尔加什、普尔坎、努拉利耶夫等歌手演述的版本进行了平行文本的比较。经由缜密的分析可知，在同一类别下，虽然歌手们演唱的《阿勒帕米西》各有不同，但这些异文的情节主线却基本相同，都包含“长期无子”“特异诞生”“英雄远征”“婚姻竞赛”等经典情节母题。但在细节上，存在着“功能”或“模式”相同而行为主体或触发主体行为的动因不同等现象。例如，在法济尔演唱的版本中，向史诗主人公的未婚妻巴尔琴发起求婚的是卡尔梅克勇士，而在其他版本中，则会出现卡尔梅克沙赫本人爱上乌兹别克美人的情况。在法济尔、朱拉巴耶夫、伯尔迪的版本中，拜布里和拜撒热两兄弟因“课税”问题而决裂，而在普尔坎演唱的版本中，兄弟二人产生矛盾的原因则是拜布里声称早晚拜萨热的财产都要归女婿阿勒帕米西所有。^[7]可以发现，在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不同艺人的演唱风格不同，即便在相同的故事框架之下，细节的差异也会催生出不同的情节。显然，从一方面来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歌手本人学习的文本以及演唱的偏好不同；从另一方面来看，情节的背后渗透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不同的情节细节当中，可以看到与“宗教”“婚俗”“部落制度”等历史现实问题紧密相关的民间文学元素。

在分析《阿勒帕米西》不同版本的主要情节时，日尔蒙斯基突破文学体裁的边界，将“史诗”与“故事”研究相结合，通过共有的情节母题推断影响史诗生成的故事类型。例如，在朱拉巴耶夫演唱的版本中，阿勒帕米西与卡拉江的比试与“AT590型故事”的情节类似；在普尔坎的版本中，英雄暴食的情节与“AT1149型故事”有些相似，阿勒帕米西与巴尔琴

婚礼的场景又让人联想到“AT519型故事”的情节。以阿尔奈—汤普森的故事类型索引为工具，日尔蒙斯基发现，一些民间故事的母题和情节事实上为多民族所共享。

一方面，可以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接触与传播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民族构成多样，存在双语乃至多语环境，这为不同民族的故事、传说、史诗的交融提供了便利条件。相比于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史诗，从体裁和风格来看，故事在同一文化圈层内显然更容易传播，因此也成为史诗分析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这说明民间文学内部文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能够跨越体裁的界限传播。尤其是对于歌手来说，他演述的故事、传说、史诗都取材于他本人的“传统池”，情节与母题的互文性并不会受到体裁的严格制约。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一切艺术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8] 史诗虽然不是编年史，但它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艺术形式。以乌兹别克的《阿勒帕米西》为例，它以父权制游牧部落为背景展开，真实的历史与民俗交织在古老的故事文本之中。因此，在发现民间故事对于史诗文本分析的重要性的同时，日尔蒙斯基也注意到史诗、故事与神话还有民俗仪式之间的潜在联系。尽管为了把激励人民情感的事件的鲜明特征纳入自己的框架，陈旧的模式已发生变形。^[9] 以史诗第二轮叙事中的“乌尔坦强娶巴尔琴”这一情节为例，日尔蒙斯基注意到它与突厥语族民族历史上“转房婚”制度的联系，并以波塔波夫在拜孙地区搜集到的乌兹别克弘吉刺特部落的民族志资料为佐证，说明直至20世纪，该部落仍有这样的习俗留存。^[10]

在挖掘《阿勒帕米西》与神话、仪式关系的过程中，日尔蒙斯基一方面从民族史和民族志的角度探究，一方面注意到更具奇幻色彩的蒙古民间故事和史诗对于突厥英雄史诗研究的重要意义。在突厥史诗《阿勒帕米西》与阿尔泰勇士传说《阿勒普—玛纳什》之间搭建桥梁之后，日尔蒙斯基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出发，将拉德洛夫、波塔宁、符拉基米尔佐夫等学者关于蒙古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成果吸收到突厥史诗的研究之中。他认为，斯塔索夫和波塔宁直

接将俄罗斯壮士歌和西欧史诗与蒙古史诗《格斯尔》的个别情节进行对比,甚至试图从蒙古史诗中寻找前者的情节和人物原型的对比研究是笼统、粗浅且浮于表面的。^[11]与他们不同,日尔蒙斯基将蒙古史诗与民间故事视为解码突厥英雄史诗、故事与神话关联的关键线索。因为二者在情节和叙事模式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而且蒙古史诗中保留了更多古老的神话和故事的痕迹。仅以“格斯(萨)尔”为例,在藏缅语族、突厥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等多民族的神话、故事、史诗中都能发现与之相关的故事。涅克留多夫曾指出,格斯尔不仅是许多叙事传说和长诗的主人公,也是宗教神话崇拜的对象,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既有口头流传的,也有书面形式的。这些作品的形成和流传的历史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景,从中可以看到种族与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体裁和情节的结构转换,神话和历史以及口头和书面文学的互动。^[12]

于是,日尔蒙斯基着重挖掘蒙古史诗中带有奇幻色彩的“故事元素”,对突厥—蒙古史诗和民间故事进行情节与母题分析,并从“神话—仪式”的角度将蒙古民间故事化为沟通突厥史诗与勇士故事之间的桥梁,搭建二者之间的联系。日尔蒙斯基这种从民俗仪式的视角研究突厥英雄史诗,并辅以蒙古史诗和民间故事为桥梁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乌日古木勒在《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中业已从母题与仪式角度阐明了蒙古—突厥英雄史诗的共性与特性。^[13]不过仍需承认,日尔蒙斯基虽然注意到蒙古史诗对于突厥史诗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他对突厥—蒙古史诗的比较研究存在局限性。原因之一在于,他把蒙古史诗和故事作为“桥梁”使用时忽视了对后者的整体性考量。

除了不同版本的异文外,日尔蒙斯基对演说文本的史诗艺人本身也十分关注。与古典史诗不同,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为研究者提供了与歌手直接交流的机会,相关学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史诗生成的动机。以乌兹别克著名说唱艺人法济尔为例,他演述的《阿勒帕米西》与其他史诗艺人演述的版本相比更具现实性,其中关于伊斯兰教圣人的情节显然更少一些。据法济尔本人透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听众更好地关注到英雄阿勒帕米西作为“人”

的英雄气概,否则听众可能会产生只要有圣人帮助,即便是羸弱之人也可以无所不能的印象。此外,他还表示,自己在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面前演述英雄达斯坦时会着重介绍主人公的伊斯兰教信仰及其曾跟毛拉学习的情节。^[14]日尔蒙斯基对史诗演说艺人的关注使人相信,优秀的歌手并不是如同留声机一般将自己学会的内容复述出来,他们的创编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此外,在进行文本比较时,史诗艺人的意见对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法济尔所演唱的《阿勒帕米西》中,参加婚姻竞赛赛马项目的有500匹马,而在普尔坎所演唱的版本中,马匹的数量为6万匹。根据扎里弗夫的记录,法济尔曾批评那些风格夸张的歌手所演唱的内容并不符合现实,只有最优秀的卡尔梅克勇士才能参加赛马,马根本不可能会有6万匹之多。^[15]通过与史诗艺人的直接交流,我们才有机会直观地了解史诗异文诞生背后的主观因素。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日尔蒙斯基在对《阿勒帕米西》的源流进行分析时,将史诗的生成流变机制与民族起源和迁徙的过程放在同一背景下考量,他的类型学研究既涉及历时的文本流变分析,也涉及共时的平行文本比较。其中,前者意味着将文本置于民族历史中进行考察,后者则以情节和母题的比较研究为主。日尔蒙斯基与普罗普史诗学研究的交叉性以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理论为根基,类型学为统领。在梅列金斯基看来,日尔蒙斯基的史诗研究理论和方法与普罗普殊途同归,但我们能够发现,他们的研究存在一个不同点:普罗普在进行民间文学文本的结构分析时,习惯于将文本高度抽象化,以便看清其内部结构,而日尔蒙斯基则不然。过去,普罗普曾以歌德植物学和骨学研究中的“结构”来类比自己对民间文学的形态学分析。^[16]相应地,我们可以说日尔蒙斯基的历史类型学研究架构实际上是一种“三维坐标模型”。

但显然,在个案的分析中,历时与共时研究往往难以兼容。对此,日尔蒙斯基的处理方法是,先用共时的方法进行分类,后在每一个类别的内部进行历时研究,并根据文学文本、民族志、民族史等文献对类别间的交叉文本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分析。这

意味着研究者一定通过大量的资料作为论述的支撑，为此，日尔蒙斯基构建了“阿勒帕米西”文本集合，构成该集合核心圈层的是流传于中亚地区的“阿勒帕米西”史诗，次级圈层的是“阿勒帕米西”传说与勇士故事，再次则为包含“阿勒帕米西”核心情节单元的其他故事与传说，而最外层则为“阿勒帕米西”文化圈层外的各种民间和作家文学文本。

我们可以发现，日尔蒙斯基对《阿勒帕米西》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不局限于某个版本。更确切地说，他是先建立《阿勒帕米西》文本类型群，然后将该类型群放置于突厥语族民族历史和世界文学的广阔图景之中进行史诗学研究。在此过程中，日尔蒙斯基发现了《阿勒帕米西》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在“丈夫归来”^[17]情节上的相似性，突破性地将突厥语族民族史诗与西方古典史诗放在同一舞台上进行比较，并将《阿勒帕米西》与《奥德赛》中共有的“受到侮辱的父亲”“受压迫的儿子”“忠诚的牧羊人/猪倌”“对仆人的考验”“英雄身上的标记”等母题进行详细对比。除了情节的比较研究外，日尔蒙斯基还将古希腊神话、中世纪骑士小说、德国英雄叙事诗等多种文学作品，以及“十字军东征”这一特殊历史背景纳入分析范畴，在对以上因素进行充分考量后才得出了《阿勒帕米西》与《奥德赛》同源的结论。因此，可以说日尔蒙斯基关于“回归歌”的跨文化比较在史诗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但应注意，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由于缺少对蒙古史诗的整体性考量，日尔蒙斯基对突厥—蒙古史诗的比较研究还存在局限性，比如在进行“回归歌”的讨论时，他并没有把蒙古史诗中的“英雄归来”纳入讨论之中。如今，这一部分的缺失为陈岗龙所增补，后者在海希西、仁钦道尔吉等学者对蒙古英雄史诗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将英雄史诗“回归歌”的讨论在内容和理论向前推进。^[18]

综上，日尔蒙斯基对突厥英雄史诗《阿勒帕米西》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他的历史类型学研究方法。在广泛地搜集与“阿勒帕米西”相关的文学和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日尔蒙斯基梳理了这部史诗生成的脉络，对史诗的基本类型进行了划分，利用民族志材料对史诗中重要情节母题的阐释进行了补充，并对

跨越民间文学体裁的文本流变“内部逻辑”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日尔蒙斯基并没有忽视史诗艺人在诗歌传承与发展中起到的能动作用，他从个人、地区、流派等多个角度出发，对影响史诗艺人演唱的因素进行分析。在“口头诗学”“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关注史诗演唱艺人的重要性已经无须多加论述，但在彼时，日尔蒙斯基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开创性的。此外，日尔蒙斯基从发生学的角度对《阿勒帕米西》与《奥德赛》进行的缜密分析打开了东西方史诗比较研究的新格局，使我们看到在传统的个案分析，或同一文化圈层内的比较分析外，史诗比较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余 论

从俄罗斯史诗学研究发展的总体历程来看，日尔蒙斯基的史诗学研究有着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他在批判地继承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和“情节诗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以弗雷泽为代表的神话—仪式学派和以阿尔奈—汤普森的“故事类型索引”为重要成果的地理—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与同时代的普罗普等学者共同发展了历史类型学理论。尔后，梅列金斯基提出，日尔蒙斯基和普罗普分别将“历史性”与“英雄精神”视为史诗的基本特征^[19]，并将二者相结合，对英雄史诗的起源进行了综合分析，接着他们的学术思想又作为俄罗斯史诗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后世不断传播和发展。

日尔蒙斯基在“神话”“故事”“史诗”构成的民间文学图景中找到了微妙的平衡，他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厘清了原本“含混不清”的文本集合的脉络。在传统的故事学研究中，“印度—中亚—阿拉伯—伊朗”的流变分析长期以来都是相关学者关注的话题。但在史诗学研究中，跨越地区，尤其是跨越文化圈层的研究相对更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史诗规模宏大，结构完整，且往往与民族历史联系紧密，相较于故事，“史诗不易发生‘迁徙’，也相对较少借用其他民族的情节和形象”。^[20]另一方面，各民族和地区史诗收集、整理的情况不尽相同，这也给跨文化比较研究增加了难度。日尔蒙斯

基史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他能够在“总体文学”思路的统领下将印度、中亚、伊朗乃至西方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故事、传说、史诗都吸纳进自己的史诗研究系统,从中提取具有研究意义的情节母题。然后,在平行比较的基础上,将这些文本置于历史背景和史诗演述传统池内部进行分析,并将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家文学纳入考量范畴。最后,将比较研究中得到的关键要素纳入“主线”,从而构建出一个立体的史诗架构。

在更广阔的研究视角下,我们发现,文本生成的机制各有章法,虽然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中的问题无法用同一套理论去解决,但史诗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唱诵,小说在某种社会文化思潮中被创作,突厥—蒙古史诗中诸如“求子”与“特异诞生”这样的

成对母题,俄罗斯魔法故事中类似“禁令—违令”的对称映射以及戏剧理论中的“契诃夫之枪”在叙事逻辑上却是相通的。“史诗是英雄主义理想化下的人民鲜活的过去。史诗具有科学的历史价值和巨大的社会文化教育意义。”^[21]日尔蒙斯基以文本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引导,在时间与空间的广泛互动中寻找史诗的源头与流变的规律,将文学与民族历史和民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他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视角出发,将西方古典史诗与东方口传史诗进行跨文化比较的尝试,打破了东西方史诗研究的壁垒,对于现代文明交流与互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李文)

注释:

- [1] 本文为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东方史诗的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01)的阶段性成果。
- [2]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как проблем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9, стр. 18.
- [3] Кононов А. Н., Мелетинский Е. М.,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Жирмунский В.М., Тюркски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4, стр. 7.
- [4] 在不同的民族中英雄的名字有些许差异:乌兹别克称“阿勒帕米西”(Алпомиш),哈萨克、卡拉卡尔帕克称“阿勒帕梅斯”(Алпамыс)等。本文用“阿勒帕米西”统称指代。
- [5]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Вопросы генезиса и истории эпического сказания об алпамыше., Об эпосе «Алпамыш»,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1959, стр.27-28.
- [6]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Сказание об Алпамыше и богатырская сказ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тр. 30-31.
- [7]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Сказание об Алпамыше и богатырская сказ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тр. 23-25.
- [8]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周扬译:《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87页。
- [9] [俄]维谢罗夫斯基著,刘宁译:《历史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484页。
- [10]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Сказание об Алпамыше и богатырская сказ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тр. 302. См. Потапов Л. П.,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семейно-родовому строю у узбеков-кунград, «Научная мысль», 1930, стр. 37-52.
- [11]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Сказание об Алпамыше и богатырская сказ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тр. 252.
- [12] [苏]涅克留多夫著,徐昌汉、高文凤、张积智译:《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6-167页。
- [13] 参见乌日古木勒:《蒙古突厥史诗人生礼仪原型》,民族出版社2007年。此外,在陈岗龙《蟒古斯故事论》、斯钦巴图《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等著作中也可见对相关话题的讨论。
- [14]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и Зарифов Х., Узбек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7, стр. 34.
- [15]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и Зарифов Х., Узбек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7, стр. 40.
- [16] [苏]普罗普著,贾放译:《故事形态学》,中华书局2006年,第179-180页。
- [17] 此为日尔蒙斯基论著中的用法,现普遍用“英雄归来”指代该情节。
- [18] 参考陈岗龙:《草原上的奥德修斯——荷马史诗与蒙古—突厥史诗的“英雄回归”主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中心与“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s/oj6BNYWWhk9YPyxCjnqgKA>。
- [19] Мелетинский Е.М.,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героического эпоса: Ранние формы и арха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4, стр. 16-17.

[20]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К вопросу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очных сюжетах,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9, стр. 336.

[21]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Эпическ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9, стр. 195.

A Preliminary Study on Zhirmunsky's Epic Study: Centered on the Heroic Epic *Alpomish*

Zhang Jingjing

Abstract: V. M. Zhirmunsky (1891–1971) 's research included linguistics, folklore, and poetics. He critically inherited Veselovsky's theory of historical poetics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typology in the study of Turkic epic. The heroic epic *Alpomish* is one of the central topics in Zhirmunsky's research of epics. He used the "*Alpomish*" texts as the foundation and combine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epics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ree genres: "myth," "story," and "epic." In doing so, he broke down barriers in the study of epic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folklore theory in Russia. Zhirmunsky's theoretical approach has influenced many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ry scholars, including figures like Mikhail Bakhtin and Viktor Shklovsky, and it is still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for studying national epics and Russian poetry. Focusing on Zhirmunsky's study of the heroic epic *Alpomish*,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 theory of epic study and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V. M. Zhirmunsky, Heroic Epic, *Alpomish*